
中國是紀律嚴明的文化嗎？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緊密文化和鬆散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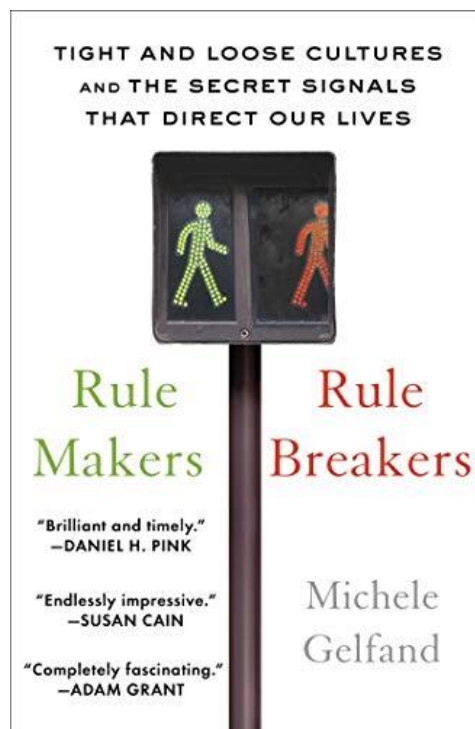
世界衛生組織於 2020 年 3 月宣布 COVID-19 是瘟疫大流行，至今已經超過一年，總體來說，除了印度，大多數亞洲國家在控制疫情上都勝於西方國家，一個常見的解釋就是：亞洲人比較有紀律和社群精神，西方人則將個人主義凌駕於其他價值。有線新聞網絡（CNN）評論員法瑞德（Fareed Zakaria）引用了文化心理學家米歇爾·蓋爾芬（Michele Gelfand）撰寫的《規則制定者，規則打破者：緊密和鬆散的文化如何聯系我們的世界》一書，從而支持這種說法，這本書在 2018 年出版，當時還未發生瘟疫大流行，但書中的內容仍然可以用來對照今天的情況。

顧名思義，蓋爾芬將文化分為兩大類：緊密文化（Tight culture）和鬆散文化（Loose culture），前者紀律嚴明，人們比較遵守規範和服從權威，例如中國、日本、南韓、德國……；後者則強調彈性，人們不喜歡束縛和尊重個性，例如美國、紐西蘭、巴西……。

蓋爾芬舉出了很多例子來說明兩種文化實際上的分別，日本和德國的火車極少誤點，一旦遲到的話，火車站的工作人員會對乘客千道歉、萬道歉；在德國的公眾地方，時鐘的時間幾乎完全一樣，差別只以秒計，但是，在巴西公眾地方的時鐘卻顯示出很大的誤差。

中國的學生非常有紀律，讀書十分用功，相反，美國學生的學習態度十分散漫，故此兩者的成績存在很大的差距，蓋爾芬認為這是因為美國學生太過任性，在麻薩諸塞州一間小學裏面，校方要對學生標示出「控制衝動」（Manage impulsivity）這句標語，從而減輕教師的壓力。

1998 年，德國汽車製造商奔馳與美國汽車廠克萊斯勒合併，但九年後，合併後的公司又再拆散為兩家，蓋爾芬認為它們合併失敗的原因之一是文化差異，德國工程師追求毫米程度的精準，美國人卻不喜歡吹毛求疵。



但話又要說回來，蓋爾芬不是一面倒地斷言緊密文化比鬆散文化優勝，緊密文化令人傾向於維持現狀和隨波逐流，鬆散文化則營造了創造性思維的環境；緊密文化重視一致性，容易導致排他的態度，鬆散文化則接受多元主義；在緊密文化下成長的人比較難去適應不明朗的處境，習慣了鬆散文化的人則比較能夠隨機應變、因時制宜。

中國社會的矛盾

筆者同意大部分蓋爾芬的分析，但值得一提的是，任何概念和分類都只是方便我們去理解世界，但真實的世界充滿了矛盾和複雜的元素。

蓋爾芬將中國歸類為紀律嚴明的緊密文化，可是，我們不難發現，中國人在很多方面都不守規矩，例如很多中國遊客都不排隊、在不適當的地方大小便、在餐廳粗魯地搶食物。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例子，就是一位教會朋友說自己在香港親眼目睹大陸遊客讓小孩子在飲水機上小便！

此外，很多中國生產商不顧安全守則和社會規範，製造黑心食品或者冒牌商品，最著名的案例就是「三聚氰胺奶粉事件」。還有，很多中國學者和學生毫不理會學術倫理，結果抄襲、作弊成風。

從前筆者在中國大陸橫過馬路和乘坐汽車的時候，都經歷過驚心動魄的場面，基本上交通規則形同虛設。當時一位中國的朋友打趣地說：「中國駕駛執照是世界車牌，如果你能夠在中國開車的話，那麼你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開車都不會有問題。」

紀律的動力：罪疚感、羞恥感、恐懼

到底我們應該怎樣去解釋以上的矛盾呢？除了緊密文化與鬆散文化之外，文化的紀律形式亦可以分為罪疚感文化、羞恥感文化、恐懼文化。在罪疚感文化裏面，社會控制是通過自我良心的省察，例如在一個基督宗教氣氛濃厚的社會裏面，人們感覺到在上帝的面前，自己做錯的事情會變成了沉重的罪責，紀律的動力源自良心的譴責。在羞恥感文化裏面，人們不想因為做錯事而令到自己和家庭丟臉，守規矩是基於群眾壓力，若果沒有人看見自己的錯誤，那麼是非對錯也沒有關係。在恐懼文化裏面，人們願意服從規範，只是因為國家採用嚴刑峻法，人們懼怕受到懲罰。

有趣的是，以上三種社會都可能製造出緊密文化，但背後的動機卻可能完全不同。筆者認為中國是屬於羞恥感文化和恐懼文化，自從中國大陸採用了人臉識別技術和社會信用制度之後，交通秩序和其他社會秩序都大為改善，然而，當人們認為自己所做的事情絕對不會被揭發、或者被揭發的可能性十分低的時候，他們既不怕丟臉，也不怕受到懲罰，那麼又何樂而不為呢？故此，筆者認為中國人的紀律嚴明多是出於他律，而不是自律。

讀到這裏，有些讀者可能以為我是故意抹黑中國，其實，任何文化都會有矛盾的成分，包括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內，希望讀者能夠以有過則改、無過則勉的眼光閱讀本文。

2021 年 4 月 22 日

[更多資訊](#)